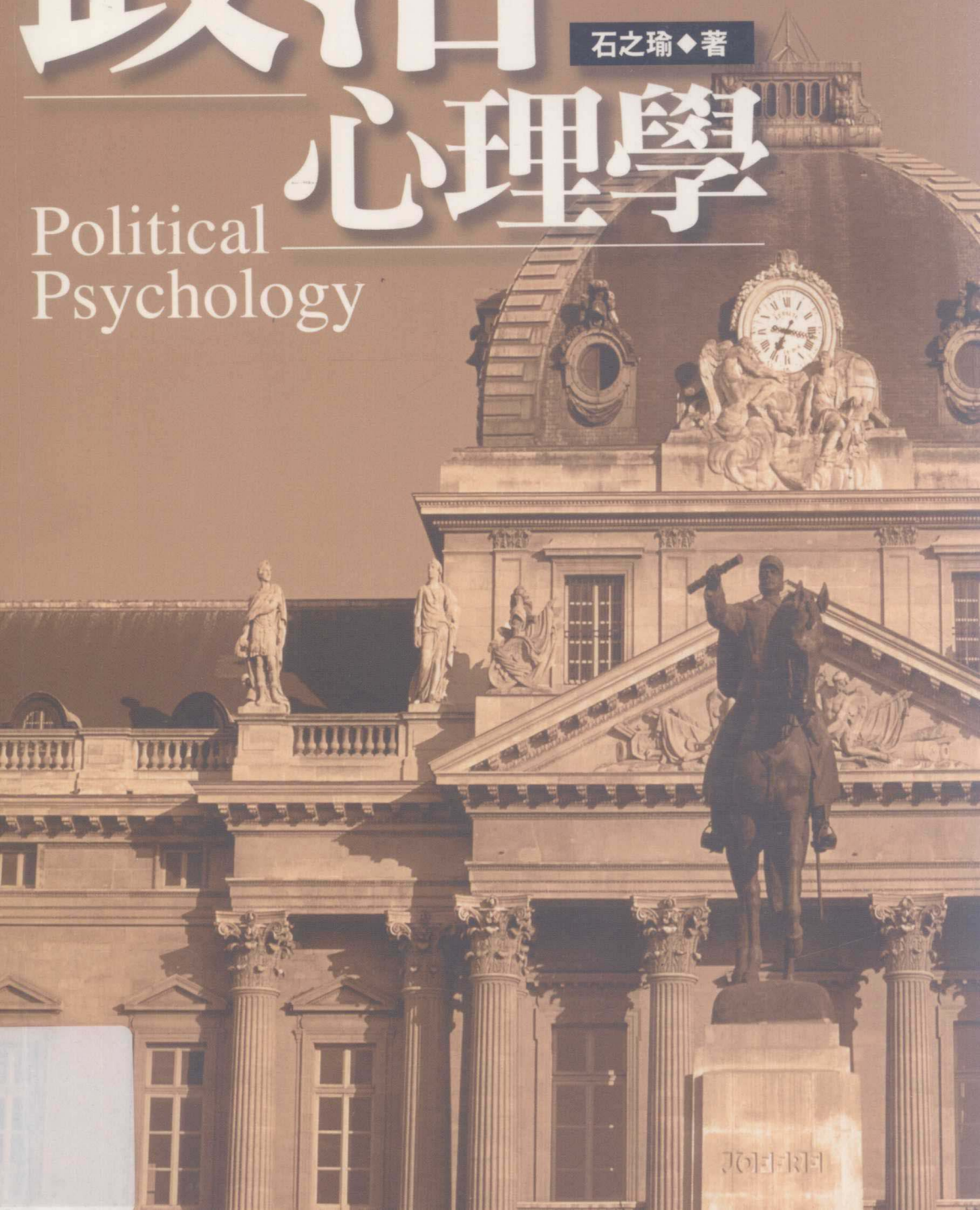


政治

石之瑜◆著

心理學

Political
Psychology





政治

第二版

心理學

Political
Psycholog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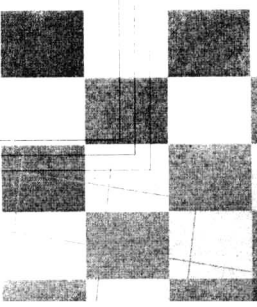


政治心理學

石之瑜 著

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

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政治心理學 / 石之瑜著.

--初版. --臺北市：五南, 1999 [民88]

面；公分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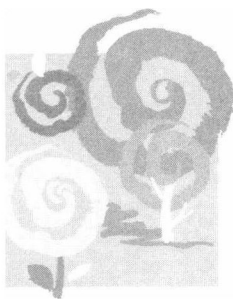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78-957-11-1854-3 (平裝)

1. 政治心理學

570.14

88009661



IPC8

政治心理學

作者 — 石之瑜

發行人 — 楊榮川

總編輯 — 龐君豪

主編 — 劉靜芬 林振煌

出版者 —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

電話：(02)2705-5066 傳真：(02)2706-6100

網址：<http://www.wunan.com.tw>

電子郵件：wunan@wunan.com.tw

劃撥帳號：01068953

戶名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台中市駐區辦公室/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

電話：(04)2223-0891 傳真：(04)2223-3549

高雄市駐區辦公室/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

電話：(07)2358-702 傳真：(07)2350-236

法律顧問 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

出版日期 1999年 8月初版一刷

2007年11月初版二刷

定價 新臺幣 350 元

序言

古之善用天下者，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。量權不審，不知強弱輕重之稱。揣情不審，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。何謂量權？曰：度於大小，謀於眾寡；稱貨財有無之數；料人民多少，饒乏、有餘、不足幾何；辨地形之險易，孰利孰害；謀慮孰長孰短；撥君臣之親疏，孰賢孰不肖；與賓客之智慧，孰少孰多；觀天時之禍福，孰吉孰凶；諸侯之交，孰用孰不用；百姓之心，去就變化，孰安孰危，孰好孰憎，反側孰辨。能知此者，可謂量權……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時，往而及其欲也，其有欲也，不能隱其情；必以其甚懼之時，往而及其惡也，其有惡也，不能隱其情：情欲必出其變。

〈揣〉，《鬼谷子》

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新涼。

蘇軾，〈西江月〉

在政治學的各個次領域中，政治心理學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學問。可以說，政治心理學家大概是所有政治學家中，唯一不把國家當成自己的研究前提的，也不假設政治行為是理性導向的。像政治理論所論述的，基本上是各國「國內」的權力機制與規範；國際政治學研究的，是「國家與國家間」的交往；比較政治學所

關心的，是「各國」政治文化的差異；政治經濟學家的重點，則是「國家」與社會的互動。而政治心理學家卻沒有這麼一致的外貌，雖然他們研究之中會隱含著關於什麼是正常，什麼是病態的看法，而且這個看法受到國家體制的影響，但並不代表他們必須以國家和社會的分立為研究前提，更不需要認為人是理性的。一般政治學家研究什麼東西可以增加權力，政治心理學家則問，什麼是權力。

對一般政治學家而言，權力是一種資源、一種工具、一個利益，或一種短期目標，但對心理學家而言，權力的意義複雜得多。有的政治心理學家的確把權力看成是利益，所以研究權力作為交換或強制取得價值的工具。但更多的其他心理學家，把權力當成是一種需要，反映出的是人格特質，不是理性計算；或把權力當成是一種社會關係，經由文化制約而進入人心，故謂又是一種道德；或把權力看為一種論述，是人們爭取主體地位，解決認同危機的過程。在政治心理學家的分析中，國家經常是分析解釋的對象，而不是分析解釋的前提，於是等於動搖了政治學的學科基礎。這是為什麼即使許多政治學家偶爾願意借助理論分析，但卻不能真正發展出政治心理學理論的原因。

這是第一本中文的政治心理學教材，整理了近五十年來的英文文獻，並說明心理分析對政治分析的啟示。書中也對政治心理學在中國文化地區的應用和侷限，進行簡單的檢討。全書一共分為七章，根據政治心理學發展的年代和議題加以區分，而不依照政治學的次領域來分章節，其目的是給予政治心理分析一個較為完整的範圍。這七章分別介紹了有關政治心理學的範圍與研究議程、政治人格與精神分析、政治態度與政治文化、政治知覺與風險決策、政治認知與情感傾向、政治認同與死亡本能，與當前流行的政治心理學教材和研究方法。

在第一章中，我們說明了爲什麼後冷戰時期，用心理學來研究政治，尤其是切身的中國政治與兩岸政策，足以發人深省。後冷戰的心理學鼓勵研究者發展與研究對象的同情關係，使研究工作能貢獻於研究者的成長。但心理學通往兩岸研究的路途曲折，其中經過政治心理學、比較政治心理學、中國政治心理學，才到達兩岸政治心理研究。本章整理這個漫長的輸入過程，呈現心理學中的不同途徑、研究議程、研究方法，討論它們的適用可能，並整合出一個研究中國政治與兩岸政策的議程。

第二章檢視的權威人格研究，可以說是當代政治心理學的濫觴，但權威人格作爲一個分析概念，迄今沒有一套完整的論述系統，這主要是因爲政治心理學家對於與權威人格研究相關的歷史、信仰、人事、組織、理論都有著千絲萬縷的牽掛，涉及到研究者個人的價值、情感和利害。人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，來將權威人格與法西斯劃清界線，這些方案包括用保守主義、教條主義、軍國主義、種族主義、民族主義來取代法西斯。權威人格研究出自於精神分析，探索的是人類內心深層經常不爲已知的傾向，這些傾向威信與人們的成長經驗相關，同時也受到社會情境的影響。人對自己的安全感、效能感決定了他／她對權力需要的程度，而權力資源的多寡又往往不能操之於我，則人如何在心理上和行爲上自我調適，來滿足自己的需要，就是我們進入社會後必須處理的一種衝動，這個衝動的強弱，所帶來的焦慮的深淺，和各種相應的心理防禦機制，都是在挑戰政治心理學家的課題，但這也說明了人爲了理解自己是什麼的這個難題，仍然必須繼續鏗而不舍的原因。

第三章指出，在當代政治心理學的議程之中，態度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。態度是一種行爲傾向，也是一種帶有好惡的情感，或反映了這種好惡的價值判斷。研究態度最主要的動機，是要將

人歸類，並預測其行爲。本章將就過去政治心理學界有關態度的研究，擇其要者作一簡介，重點是放在政治參與和對種族（包括民族）主義的討論上。除了引介西方在政治參與上的主要成果外，也介紹台灣在這方面的成果，尤其是在修正西方研究的方面。西方的研究以 Almond 和 Verba 的公民文化爲主，台灣的研究以胡佛的選舉研究爲主。最後則介紹一些關於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態度的研究。

第四章重點放在風險決策。政治行爲通常體現爲一種決策，而決策所仰賴的信息是經由知覺系統來接收，所以分析政治行爲時，不能忽略政治決策之前的信息接收過程。歷來政治心理學家關於知覺的研究角度頗多，所關心的多數是選民對候選人及其競選策略的接收過程，或國家領導人彼此之間的訊號與解讀過程。決策靠的是信息，在信息接收的過程中，人們基於認知的方便、人格的需要，和知覺系統的特性，對於信息的理解產生多種多樣的制約。政治心理學家經由實驗方法得出很多實證資料，一一說明這些制約的機制。然而，實驗室裡的研究迄今還沒有辦法在社會上照樣進行，故知覺研究在應用到選舉研究和國際研究時，以理論的適用爲主，很少有創新。本章選擇性地對西方在知覺與決策方面的一些研究，作簡單評介。

第五章的宗旨在說明在廣大的政治學領域中，認知心理學可以貢獻之處頗多，本章整理了當代政治心理學英語文獻中關於認知研究的成果。一般而言，每一個具體行動都有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但這些理由相當程度是事後合理化的說辭，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情感。對於政治心理學家而言，重點是特定認知項目所伴隨的情感有多複雜，而一項政治行動所回應的環境認知過程中，共有多少情感因素在其中？事後合理化的說辭本身會不會激起進一步的情感反應？如同外交認知與國家形象的研究指出，認

知絕不單純只是接受刺激的一個被動過程，認知具有主動性，情感也具有主動性，所以人們接收的資訊不可能等於資訊的全貌。

第六章看到的認同問題，固然是人類自始就有的問題，各種歷史文獻也斷斷續續、隱隱約約地透露出人類在這方面的掙扎，可是說到有深度的研究認同相關的課題，尚不能說有什麼新的重大突破。政治心理學家對認同現象的處理十分有限，受到主流心理學研究和現實政治兩大制約，使政治心理學在認同的研究上，甚至不能超過文學家所付出的關注。二十世紀最後十年，文學界透過女性主義、後現代主義、後殖民主義等等角度的文學作品，及針對這些作品發表的文學批判，對於認同現象提出了諸多發人深省的檢討。由於認同問題已公認是當代政治現象中的熱點、疑點、難點，所以關於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不能再坐待心理學界的主流來支援，而必須跨學科地向外汲取資源，加以整合，方有可能作出知識上的貢獻。

最後第七章瀏覽美國政治心理學課堂所採用的課本。在早期，這些讀本不是專門為大學生所寫的，而是知名學者的論著。應該說這門學問基本上並不存在，所以知名學者論著的內容為何，政治心理學的範圍就為何。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，政治心理學已經更常出現在大學的授課計劃之中，則以大學生為對象的教材便應運而生。這些教材的範圍與方法迥異，好像是在講不同課目，但有一點共通的，就是所討論的不出一般人對心理學的印象，則名之為政治心理學當然就不為過。八〇年代以後通用的政治心理學教材仍然不多。但九〇年代初期卻是一個雨後春筍的季節，以大學生為對象的課本紛紛出籠。一九九〇年前後應該是美國政治心理學界的一個轉捩年，縱使九〇年代的教材內容依舊各說各話，但輪廓逐漸浮現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支流。一個是以人格、精神分析、深層心理為主，另一個是以認知、知覺、情感為

主。

本書的寫作，首先要感謝台灣大學政治學系，因為系方在八十七學年度向教育部申請了課程提升獎勵，因此獲得支援來強化所開授的政治心理學課程品質；也感謝 Fulbright 獎學金資助，才能在一九九七年的暑假，前往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國際研究中心，進行三個月的資料蒐集。同時，Martha Cottam 教授作為良師益友，曾在代表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接待的一週當中，提供了不少諮詢意見。最幸運的是，楊國樞老師在同行的四趟旅程裡，每次都不厭其煩的答問與開導，常如醍醐灌頂。另外，三年六個學期來，參與政治心理學課堂討論的同學超過百人，大家通常是從精神分析入門，早兩年的同學還得花上一整個學期的時間，討論政治心理學對中國政治的應用，後來慢慢引進認知心理學的讀物，也比較有系統地推介本地的研究成果。書中有的思路，是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體會到的。同學雖已畢業，好在貢獻仍留了下來。最後，研究與寫作過程中，幸賴詩偉鉅細靡遺地登錄相關研究信息，如賢、鬢倫和鳳玉整編文稿，才能堅持完成工作。

但願透過這本教科書的拋磚引玉，讓更多學術工作者投入本土政治心理學的研究，建立華人政治心理的研究基礎，超越西方純粹以個人為對象的知識論與方法學。希望日積月累之後，這門學問可以幫助我們更完整的理解政治，更豐富的體會世界，更寬容的接納歧異，更準確的認識自己。

目次

序言

第一章 範圍與議程 1

- 一 心理分析的時代意義 3
- 二 從心理學到政治學 5
- 三 比較政治心理學與中國 8
- 四 心理學與兩岸關係 12
- 五 兩岸政策中的主體與認同 15
- 六 兩岸政策中的思維與態度 18
- 七 兩岸政策中的精神與人格 21
- 八 兩岸政策中的認知與情感 24
- 九 兩岸政策中的知覺與行爲 27
- 十 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30
- 十一 限制與展望 32

第二章 精神與人格 37

- 一 權威人格研究的意義 39
- 二 權威人格研究者 41
- 三 精神分析 45
- 四 退化與驚恐 48
- 五 政治行爲 50

- 六 政治態度 53
- 七 權威人格的認知 57
- 八 集體認同 60
- 九 比較研究 62
- 十 結 論 64

第三章 態度與文化 67

- 一 關於政治態度的研究 69
- 二 認知、態度與知覺 71
- 三 《公民文化》與參與態度 79
- 四 統攝性態度與結構性態度 87
- 五 種族主義 91
- 六 民族主義 96
- 七 結 論 99

第四章 知覺與風險 103

- 一 信息的重要性 105
- 二 風險下的決策 106
- 三 分合能力與知覺僵化 114
- 四 知覺過程的簡化 120
- 五 針對候選人的知覺過程 125
- 六 危機下的信息交換 130
- 七 結 論 135

第五章 情感與認知 139

- 一 政治心理學的新寵 141
- 二 情感的內容 142

- 三 情感的性質 147
- 四 印象模式 150
- 五 政治記憶 153
- 六 政治判斷 157
- 七 國家形象 161
- 八 國際衝突 165
- 九 結 論 169

第六章 認同與死亡 171

- 一 當代政治的熱點 173
- 二 什麼是認同 175
- 三 認同與死亡本能 178
- 四 後現代認同 183
- 五 國家認同 187
- 六 後殖民認同 191
- 七 性別認同 196
- 八 結 論 200

第七章 教材與方法 203

- 一 學科認同 205
- 二 一九九〇年之前的教材選介 207
- 三 九〇年代的教材選介 219
- 四 七種研究方法 232
- 五 未來方向 238

後 記 241

參考書目 245



1 範圍與議程

一、心理分析的時代意義

早幾年推動所謂行為社會科學的目的，就是要讓人們能在不必認識研究對象的情況下，了解他們，而且比他們自己更了解他們。所以，研究者不能使用研究對象所熟悉的語言，否則就會受到研究對象所影響，無法進行客觀的分析（Lakatos, 1970）。如此一來，研究對象的心理狀態，就只能視為是一個黑箱，成為社會科學家應該迴避的聖地。繼起的後行為學派重新重視「價值」作為一個分析概念，但接著就又被新制度學派迴避黑箱的研究議程取代。直到九〇年代，人們從冷戰的陰影中甦醒，驚覺於社會科學家筆下的體系、結構、理性是如此的虛偽與殘酷（Harding, 1991），致各種後實證學派的支流風起雲湧，不再承認研究者能與研究對象之間存在客觀區隔，並指陳研究者只是利用研究對象在複製特定的認同、價值、利益。人們開始大規模地對黑箱直接攻堅，甚至連黑箱這個概念，也都可以視為是政治的產物。兩岸關係研究的丕變，也就是在這個時代發生。

有趣的是，兩岸之間走的研究路線，又未必是順應後實證主義的大潮流，這與我們所處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。兩岸之間的內戰情境，與美、蘇兩大超強的對峙最大的差別，在於美、蘇領導集團之間，沒有切膚的仇恨，他們進行的折衝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觀念戰（Cottam, M., 1994a）。俟後冷戰結束，人們立刻發現，俄國人和美國人一樣有喜怒哀樂，為生活汲汲營營。所不同者，效勞於統治階級之制度與意識形態而已，凡此皆觀念的建構。於是知識界針對冷戰學術產生逆反心態，嚴重影響到以客觀中立為號召的知識論。相形之下，兩岸統治集團逐鹿中原，是由仇恨的情感所交織成的，不需要什麼觀念上的說明就理直氣壯地

把對方界定為死敵（周陽山，民 80）。故當台灣進入到後冷戰時期，要脫離舊制的時候，反而是需要借用客觀中立的知識論，來擺脫情感導向的思惟。這是台灣因應後冷戰學術潮流時，之所以表現成與後實證路線相反的原因。

結果，本來沒有黑箱情結的台灣研究者，到九〇年代面對大陸時，為了要脫離內戰的歷史脈絡，力圖從心態上疏離自己原先對大陸的感覺，以便能在研究時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，達到古典社會科學知識論的要求（石之瑜，民 86a：57—82）。這個要求不僅將大陸變成以地理疆域為範圍的一個客觀研究對象，也使前一代台灣的大陸研究者，因講求與共黨的共同生活、歷史經驗（Kuo & Myers, 1986），其研究反而遭質疑為不夠深入（吳玉山、林文程、江水平，民 84）。但問題在於，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，始終圍繞著「一個中國」的原則或政策打轉，此一原則等於否定台灣研究者外在於中國的觀察位置，讓好不容易引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台灣，進退失據。有的因此主張不拘泥於社會科學的規格，頻繁地與大陸學界、政界接觸，以求親身體會其決策過程（楊開煌，民 83，民 84；葉明德，民 83）；也有的力求拉開距離，跳脫框架，而全力維繫與西方實證主義學界的關聯，以能追求作為科學家所不可或缺的普遍性理論貢獻（吳玉山，民 83）。

在這兩種傾向之間掙扎的大多數學者，可以依照情境來決定自己的知識論：吾人在與大陸進行交流、與友朋縱論大陸情勢，或與官方提供政策建議的時候，大方地儘量呈現一己之所見所聞，引領不知情者感受大陸；但我們在發表學術論文或課堂講授時，則嚴守社會科學的分際，以數據、歸類、結構、方法為論述重點。有時在場的人背景複雜，關切各異，則兩種語言左支右絀之情事，並不罕見，這在理論界已為人點出（黃旻華，民